

# 研究成果

## 當代中國農村制度轉型的地方差異

陳志柔（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 從初入田野研究說起

我對中國農村的研究始於 1995 年從事博士論文田野工作時，我的興趣在於理解中國經濟蓬勃發展背後的驅策動力。自 1980 年代中國經改以來，沿海農村的鄉鎮企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帶動農村的工業化和所得增長。有趣的是，儘管在中央政府集權統治下，各個地區經濟成長的模式和策略卻有顯著差異。以我比較研究的兩個沿海區域為例，閩南（福建的泉州、漳州、廈門）及蘇南（江蘇南部及上海周遭）都是所謂的沿海富裕地區，它們與中西部農村相較，可說是天堂與地獄，但閩南和蘇南卻是完全不一樣的天堂：閩南農村的私營企業家開著他自己買的 TOYOTA，接待來自中東或俄羅斯的單幫客；蘇南村辦企業的廠長坐著村集體配發、有司機駕駛的 VOLKSWAGEN，款待來自南京國營廠的經理及地方銀行的行員。這些現象展現了何種不同類型的經濟制度模式？何以至此？這也是我的研究問題。



圖一：閩南農村家庭成衣廠的農民工



圖二：蘇南農村宏偉的村委會辦公室

這兩個地區的制度差異，從我展開田野工作時就自動顯現出來。因緣際會，我來到泉州海邊的村落，接待我的林老先生是該村家族領袖，過去幾年他召集村中長者，組織老人會，編族譜，修宗祠，聯繫菲、台鄉親，在鄉里間「喊水會結凍」，我在林老的四層樓住家安頓下來，不僅解決後勤補給，也由於他的背書引見，在村裡穿梭走動，大家都知道那是林家來的「台灣仔」，通行無阻，沒人找麻煩。

林老的兒子是副村長，2001 年時升為村書記，面容黝黑，短小精悍，夾著拖鞋騎著野狼 125，三句不離三字經。我到訪時，他剛剛結束西裝長褲的家庭工廠，與朋友合夥在石獅市經營卡拉 OK，但他常批判共產黨真腐敗，埋怨他的時間都花在村民事務上，沒法為自己的事業打拼，他們家比村委會辦公室還熱鬧，村民從早到晚絡繹不絕，從領生育證到排難解紛，都必須小林說了算。

就在這個村子，這戶人家，我前後住了大半年，我訪談工廠老闆、市場小販、外地民工、幹部官員、歸國華僑，甚至還有台灣跑路到此的大哥。我觀察村民的生產經營，婚喪喜慶，寺廟宗祠活動，琢磨這之間的人際互動和社會關係，從而逐漸理解一個閩南農村在改革開放中的遞變和社會基礎。

相反地，在蘇南農村，如果沒有上級幹部帶路，缺了官章文件擔保，外地人要進行學術調查研究，連門都沒有。若像在閩南一樣單槍匹馬跑單幫，肯定會壞事。那是 1996 年春天，看在我美國指導教授的面子，南京大學的一位名教授帶著我來到吳江，這位教授又找了在蘇州政府任職的一個舊識，我們乘著豪華轎車直奔農村。中午時分，在鎮上接受領導幹部們的盛情招待，體會太湖水釀製的名酒，酒足飯飽後，來到了鎮政府有冷冽空調的豪華會議室，沒

多久賓主大夥兒就躺平了，我的收穫是一疊名片。接下來，我們到了本鎮第一村，異於閩南農村螞蟻雄兵的家庭工廠，該村的龍頭企業是生產聚酯顆粒的村辦企業，年產值上億元。參觀沒多久，五點不到，村幹部說該吃飯了，我們又是一陣杯觥交錯，盛情交流，又是一疊名片和滿嘴江南名菜。正當我焦慮不得其門而入之際，恰好在晚餐席上跟兩個村子禮聘來的天津工程師搭起了讀書人的友誼橋樑。後來幾個月，我一方面在上海訪談，另外也三不五時來到這個村子，工程師成為我無話不談的朋友，透過他們，我逐步瞭解這個村子的企業發展和權力結構，我也逐漸和當初拒我千里之外的村幹部們建立起了互信的情誼，打開他們的心扉讓我一探究竟，我們最後也成為好朋友。

從那時起，我與田野朋友們一直保持聯繫，也在往後陸續回訪補充田野材料，追蹤發展的軌跡，他們的故事是我理解中國變遷脈動的窗口。騎著摩托車的閩南村書記盼望來台灣一遊，他家族在台西的宗親答應接待安排；乘著黑頭轎車的蘇南村書記在 2002 年來到了圓山飯店，他發請帖邀請我去參加他的招商說明會，會後我帶他到光華商場買了一部筆記型電腦，他要送給在澳洲念高中的兒子。隨著觀察我田野中朋友的變化，也體會出中國的變化。

### 學術研究的成果

我的田野研究收集了有關中國農村制度轉型的第一手資料。我的研究成果可以從 3 個方面來說：（1）以地方制度解釋當代中國的制度轉型，呈顯地方制度的關鍵影響力；（2）以深入細緻的田野資料，剖析沿海農村市場經濟內涵及其多樣性，並強調農村的市場經濟轉型，並非必然趨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的開放市場經濟模式，而是蘊含不同地方特質的經濟制度；（3）彰顯深度訪談的田野研究典範，超越官方文獻、新聞報導及統計資料的限制，由此累積實證發現。

解釋當代中國經濟制度轉型的文獻，多以國家政權及官僚領導，或市場機制及市場刺激作為主要的歸因，我的研究彰顯地方制度的作用和影響。雖然國家官僚以及市場機制在農村產權制度變遷過程中，都發揮了相當的影響，但單單依靠國家官僚制度或市場機制作為解釋變項，仍有所欠缺，唯有加入地方制度的分析，瞭解地方制度與國家、市場的互動關係和影響過程，才可能更完整地解釋當代中國大陸的制度轉型和地區差異。

我的研究呈顯閩南和蘇南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置身於迥然不同的地方制度環境之中，從而塑造了它們各自的財產權內涵及轉型過程。閩南的鄉鎮企業以家庭小工廠及私營經濟為主幹，奠基於以家族主義為經緯的社會網絡和資源動員過程；蘇南的鄉鎮企業以集體企業及政府領導為核心，是建立在地方官僚和農村菁英的權力網絡之中。也就是說，各地區性質殊異的地方制度，制約或導引了相應的地方經濟制度與權力結構。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當代中國發展道路的多樣性，以及制約各種發展模式的地方社會基礎。制度環境的誘因結構受制於地方制度，因此經濟制度的轉型未必朝向趨同性，其中非正式限制反而是解釋制度變遷的關鍵因素。儘管制度變遷多肇始於國家統治者發動的政策變革，但地方制度會制約制度變遷的路徑，因此展現了經濟或政治制度轉型鑲嵌於地方社會的過程。

市場化浪潮下的中國地方經濟，未必是走向西方的自由經濟模式。例如：蘇南鄉鎮企業私有化的過程和後果，雖然表面看起來是市場經濟的後果，但私有化的起源來自地方政府的政策要求，私有化的過程並沒有體現市場經濟的公開、競爭、價格機制，反而是菁英壟斷的封閉式交易，這些產權交易鑲嵌在地方幹部既有的小圈圈之中。就財富分配的後果而言，蘇南急速拋棄社會主義的遺產，菁英與平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急速擴大，閩南則是地方家族領袖及經濟菁英被黨國機器吸收（或互相吸收）。

當代中國近 20 餘年來在政治經濟各方面急速地變遷，但相關的新聞報導、官方文獻和統計數字並無法呈顯社會運作的本質或全貌，唯有仰賴研究者以正確的概念工具，深入實地調查，方可能掌握社會轉型的實在脈絡。身處中國對岸的台灣，在理論上及現實上，都必須正確地理解當代中國成長和變動的本質，因為中國的當下與未來，對台灣的發展與成長，息息相關。